

对国服概念的探讨

钱欣

(东华大学 服装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 以国服应具备的特性为界, 对国服概念加以确定。并以此定义为准, 对旗袍、中山装、唐装可否称之为国服分别予以论证。再通过此3种服装的相互比较, 进而分析国服不同的产生发展形式。

关键词: 国服; 概念; 象征性; 形制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 (2009) 06-0049-03

A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ion of "Guo Fu"

QIAN Xin

(Clothing College,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y to make a borderline for the character of "Guo Fu" and also try to fix the conception of "Guo Fu", using this conception to demonstrate Qi Pao, Zhongshan Zhuang, Tang Zhuang and divide them whether could be called Guo Fu. The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ose three kinds of costumes, their different formalizations of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Keywords: Guo Fu; Conception; Symbolic; Shape

近来, 呼唤国服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 国际交往之日益频繁, 势必引发民众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 人们需要一种能指代象征中国文化的服装。另一方面, 不少人感叹泱泱大国之五千年文化, 灿若繁星的国粹中竟无国服, 不觉令人引以为憾。

然而, 究竟何谓国服, 至今尚无定论。有人力荐旗袍, 有人推崇中山装, 亦有人认为唐装足可称之为国服。之所以各方颇有争议, 在于对国服的观念未有明确, 而任何有关国服的议题讨论, 均需以国服概念明确为前提。

1 国服概念的界定

何谓国服? 望文生义, 可解为一国之服。此为最广义和抽象的理解, 而如何界定其概念, 需从特性入手。国服具有哪些特性, 或言具备哪些条件的服装可称之为国服, 这是界定其概念的关键所在。笔者试从当代人对国服的认知现状、国服的指代象征性、外观特性和应用性4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 按当代人们对国服概念的各执己见的穿着现状看, 当人们在出席正式场合时, 女以旗袍为首选, 但是更偏好改良样式的旗袍; 男以中山装和唐装为首选, 但是中山装和后起之秀的唐装在穿着场合上有所区别, 前者更为庄重, 后者则偏向喜庆。而与大众的选择持有不同意见的一些年轻学生却提出国服应以改良道教服装的形制为好。一时间使得国服之概念难以判断。

其次, 从符号论的观点来看, 服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国服区别于其他服装的首要特点, 在于其象征国家文化特质以及风俗习惯的指代性。就服装的外观形态而言, 必须具备区别于他国文化、风俗的符号标示。而就着装行为而言, 穿着国服者可借此解释自身身份或文化品位, 而观者亦可通过服装外观加以判断。此外, 国服的象征意味必须旗帜鲜明, 不可含糊不清, 这就要求服装中所包含的标示元素必须符号大众的认知结构。换言之, 服装本身所传递的象征意味为大众所普遍认可。

再次, 服装的国家象征意味通过服装外观的标示元素来表达。此类标示元素林林总总,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 可分两类: 其一为中国传统服饰元素的延承或发展; 其二为固定的国家象征标志, 如国徽、国旗以及“中国”字样等。笔者认为, 利用后者来表达“中国”含义的服装不可认定为国服。试举一例, 国际赛事中, 中国运动员所着比赛用服以国旗及“中国”字样来标示身份, 但服装形态本身与中国传统服饰并无渊源, 更不能象征中国的文化特质以及风俗习惯。故而, 不可归于国服一类。

最后, 国服是能满足现代社会正式场合着装需要的服装。由此, 有两方面的限制: 一需满足现代社会社交礼仪, 尤其是正式场合的礼仪规范。就此而言, 中国传统服饰中马甲一类则不适于称之为国服。二应方便实用, 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此一来, 传统襦裙之裙等, 虽具有浓厚“中国”意味, 却因其形制限制不易于为现今大众所普遍接受, 也不可列为国服。

笔者认为, 国服一词并非特指某种具体的服装形

收稿日期: 2009-02-24; 修回日期: 2009-04-07

作者简介: 钱欣 (1959—), 女, 副教授, 主要从事服装设计 & 服装文化研究。

式，而是服装类别的名称。国服是应用于现代社会正式场合，蕴含中国传统服饰元素，能区别于他国服装并能明确象征指代中国历史文化沿革或风俗习惯的服装类别。

2 典型服装分析及比较

通过以国服应具备的特性为界，对国服一词作出定义，并以此定义为准。现对几种颇受争议的典型服装，即旗袍、中山装及唐装分别加以简要的分析论证。

2.1 旗袍

现今所言旗袍，多指民国时期形成的中西合璧式改良旗袍。之所以称之为改良，是相对于清时的旗女之袍而言。最初的旗女袍服经过了廓型、局部结构、装饰手法及面料运用等各方面的西化，最终演化为凸显中国女性审美的改良样式，也称民国式样。

晚清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旗袍成为中国女性之常服，其普及程度亦是空前绝后的，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与此同时，国门大开，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旗袍作为中国女性、中国民俗文化之象征在整个东西方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和认知。因而在东西方认知结构中，旗袍是区别于西式服装及东方其他民族服饰的典型中式服装，其鲜明的中国象征意味不容置疑。而从服装形态来看，旗袍的“中国”意味来自于中式传统服饰的结构造型和公认为国粹的丝绸面料，如立领、盘扣、侧摆开衩以及直裾造型等。从面料上看，旗袍大都以丝绸为首选，尤其是中国的丝绸品种丰富，适用于四季，丝绸的传统织花和印花对中国传统文化图案的表现，不同的图案寓意和色彩，能使旗袍外观端庄、喜庆、典雅，应不同正式场合而宜之。旗袍集中式造型、传统图案和丝绸材质等元素之大成，构成了极具“中国”象征意义的符号，提供了可供辨认的线索。时至今日，在各类正式场合中，不少中国女性仍以旗袍为首选，旗袍的礼服性质也日趋强烈。

由此看来，旗袍符合国服的特性要求，也不可否认承载过国服使命。然而，反对旗袍国服论者，多对旗袍“血统”颇有微词。认为旗袍先由“夷族之服”而来，后经西化而定型，难以体现以传统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特质和风俗习惯。持此论者，对国服的理解存在两处偏差：首先，此论武断地将国服等同于汉族服饰，显然是对国服概念的曲解。国服乃“一国之服”，而非狭义的民族服装。其次，此论者忽视了国服的象征意义不止于文化、风俗的延承，还包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的变迁。当人们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皆与“夷”、“洋”有所关联。

2.2 中山装

众所周知，中山装因孙中山参与设计并长期穿用而得名。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中山装从最初产生到形制确定以及发展演变均有其特殊性，而这些特性均与其国服属性有所关联。

毋庸置疑，中山装是特殊时代历史变革的产物。据传，最初的中山装是曾东渡日本留学的孙中山先生以日式学生服为原形，融入自己的想法，并请广东籍洋服裁缝黄隆生代为制作。此后，1916年，“红帮裁缝”王才运等人依据孙中山的意见在此前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此时的基本形制为：立翻领，对襟，前襟5粒扣，四方贴袋，3粒袖口装饰扣，后片不破缝。

这一特殊形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首先，前襟5粒扣，代表五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借以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其次，前身四方口袋借喻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再次，衣袋上的4粒扣寓意人民拥有“选举、创制、罢免、复决”的权力，而袖口3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最后，后背整片不破缝设计则象征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看似简洁、规整的服装，各部结构可谓是寓意深刻。究竟是否是中山先生的本意，或是他人评说，未有考证。

可以肯定的是，中山装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瓦解之时，伴随辛亥革命而来，绵延大半个世纪之久，一直被约定俗成成为中国现代男装代表，对其中国意味的象征意义，少有争议。中山装整体结构造型中，保留了中式传统服装的立领造型，但其浓厚的中式韵味并不仅来源于此，还得益于中国近代各时期的领袖人物的一致青睐。时至今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某些重要场合仍穿着中山装。如此看来，中山装完全具备国服所必需的特性，可被看作当之无愧的国服。

2.3 唐装

相对于中山装的“正襟危坐”，唐装则显得格外喜气洋洋，而唐装的产生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2001年，APEC会议在中国举行，依据会议的惯例，与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将穿着富于会议主办国特色的服装，以示友好。经过专家们的精心设计，唐装应运而生。

所谓唐装，并非特指唐朝服装。取“唐”字，意欲借“大唐盛世”之意，寓意中国之繁荣昌盛。基于此概念，唐装的外观形态喜气且隆重，包含了丰富的中式传统服装元素。结构上采用中式立领、对门襟、“一字形”布纽；色彩上多采用中国传统的喜庆色彩，如纯度高的大红、藏青等；面料以中国丝绸传统织锦缎为首选，传统清底团花图案，如梅兰竹菊、五福捧寿等，十

分鲜明地象征中国的特征。随着APEC会议的成功举行,各国领导人身着唐装的形象为各国媒体所津津乐道。一时间,男女老少,举国上下,甚至海外华人皆以唐装为尚。唐装几乎成为中装的代名词,其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自是不言而喻。唐装在APEC会议的背景下产生,唐装又发展出多种丝绸种类运用为一身的现代设计手法,使得唐装的设计走向了时尚化的道路。可供各类正式庆典场合穿着已是既成的事实,加之其丰富的中式服装元素和深入人心的象征意味,称其为国服亦是无可厚非。

通过对旗袍、中山装以及唐装的形成及形制作简要分析,并与国服的观念一一比对,结果说明,旗袍、中山装抑或是唐装均具备国服所必要的特性,符合国服的观念,均可称之为国服。在纵向分析比对之后,不妨对此3种国服再作横向比较,通过比较其异同可对国服有进一步深入的理解。

先谈共性。如前述,三者的相同之处即是国服之特性。除此以外,通过以上对3种服装的形成发展的梳理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均产生于某个特殊的时代或特定的时期,集结了各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质,如旗袍之西化,中山装之民主共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服装本身形制的沿革,最初的时代象征意义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现今就少有人会将中山装袖口3粒纽扣直接联想到三民主义。最终,时代象征意义被更为抽象的国家象征意味所取代,这也是国服发展沿革的特点之一。

再看相异之处。如前述,旗袍、中山装的形制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积淀,也可以说是相沿传承,自然形成,而唐装的形成则不尽相同。唐装虽然包含了丰富的中式传统服装元素,却不是长时间的自然生长,而是当代设计师们对传统元素进行了有意义的设计和重组后的结果。由此看来,国服不是恒定不变的几种服装款式,在满足上述几点必备特性的基础上,国服可以被设计与更新。因而,在当代设计师的努力下,通过对中国传统服饰元素的提炼、重新演绎,加之新鲜时代感元素的融入,有意义的国服设计必将会整旧如新。

3 结 语

通过对国服的观念和基本形制的探讨,笔者认为:

1) 国服即一国之服,是可应用于现代社会正式场合,蕴含中国传统服饰元素,能区别于他国服装并能明确象征指代中国历史文化沿革或风俗习惯的服装类别。

2) 旗袍、中山装和唐装都具备国服所必需的特性,符合国服的观念,均可称之为国服。

3) 唐装并非唐代的服装仅指具有象征中国特征的当代男式国服。

4) 国服的产生形成,既有历史文化积淀的自然形

成,也有当代设计师的设计与更新。国服不是几种恒定的服装款式,随着时代的变迁,新鲜文化的注入,国服也将随之不断发展更新,新的国服样式也可能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 [1] 袁杰英. 中国历代服饰史[M]. 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2] 安毓英, 金庚荣. 中国现代服装史[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 [3] 包铭新. 近代中国女装实录[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4] 丁锡强. 新唐装[M].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2.
- [5] 白云. 中国老旗袍[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 [6] 袁杰英, 沈蓁. 中国旗袍[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

浙江省春茧开秤收购价格 略低于2008年

进入6月份,浙江省春茧收购陆续开始,由于今年春茧茧质较好,收购价格总体好于预期,略低于2008年同期水平。据对湖州、嘉兴两市监测显示,5月31日,湖州春茧平均收购价格每担为98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0元,减幅为3.92%;嘉兴每担为92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6元,减幅为1.71%。

从今年两市春蚕生产情况看,饲养量大幅下降,而张产有所提高。湖州全市共饲养春蚕为18.00万张,比去年同期减少5.36万张,减幅达22.95%。嘉兴为25.74万张,比去年同期减少10.84万张,减幅达29.63%。由于今年气候正常及蚕农精心管理,张产总体有所提高。湖州今年预计春蚕每张单产为52.50 kg,比去年同期略增4.30 kg,增幅为8.92%;嘉兴预计每张单产为47.00 kg,与去年持平。

另外,据对嘉兴市丝绸公司了解,目前920元左右的收购价格,生产成茧丝后销售出去会形成倒挂,但鉴于今年蚕种发放量大幅减少,蚕农饲养积极性下降等因素,也只能以此价格水平收购。同时,今年工商部门对蚕茧个体收购的管理工作有所减弱,致使个体收茧户十分活跃,这也是今年茧价不过份下滑的原因之一。

(中国茧丝网网)